



（上接1版）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这一年，是我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30周年、东西部扶贫协作20周年。这次座谈会后，东部地区、中央单位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帮扶力度明显加大。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这一年的2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国务院扶贫办按要求准备了一个专题片，反映深度贫困地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看到一些地区还很落后、群众生活还很艰苦，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于是6月召开这个座谈会，请省市县三级书记来，研究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会后，国家就指导“三区三州”所在6省区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各地结合实际确定深度贫困县、乡、村，各方面集中力量攻坚。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任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座谈会。这个时候，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总书记安排身处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织书记和挂职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参加座谈会并进行交流讨论，进一步加快了脱贫攻坚的步伐。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这时，距离完成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总书记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并且，总书记考虑得非常周全，要求把防止返贫摆上重要位置，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对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予以帮扶。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这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总书记临危不乱，及时召开这次座谈会，尽早动员部署，让大家从容应对，稳住了阵脚。这次座谈会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所有省市区党政“一把手”都参加并作书面汇报，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一直开到县级。除主会场外，各地设了2516个分会场，共5.2万人参会，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338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总书记发出了脱贫攻坚总攻动员令。

除了这5个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几乎在每个重大场合、每个关键节点、每个重要时刻，都会强调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全过程，总书记始终靠前指挥，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决策、重大部署，指引脱贫攻坚保持着正确的前进方向，鼓舞着全党全社会万众一心、奋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四是较真碰硬考核。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扶贫工作要务实、脱贫过程要扎实、脱贫结果要真实、脱贫成效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所以中央就明确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1次成效考核。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成效考核情况汇报，审定考核结果，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总书记的要求始终是严格的，体现了兑现承诺的坚定意志和责任担当，我们很受教育。

考核主要采取年终考核和平时情况相结合的方式。年终考核主要有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媒体暗访四种形式。平时情况主要汇集纪检监察、民主监督、检察、审计、财政、扶贫以及“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易地搬迁等相关主管部门发现的问题。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后，评出好、较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对综合评价好的省份通报表扬；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省份，约谈党政正职；对综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问题突出的省份，约谈党政分管副职。2016年以来，累计有13个省份被约谈，其中有3个省份被约谈2次，2020年约谈了24个县。

约谈时，首先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听取考核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再通报考核中

发现的主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分管领导同志提出整改要求，被约谈人作整改表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考核评估情况通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各省区市逐一反馈考核评估发现的问题，组织各地进行整改。不仅被约谈的省份要整改，没被约谈的省份也要举一反三进行整改。3个月内不安排脱贫攻坚督查检查，让基层集中精力整改。

2016年第一次考核，22个省区市中，产生8个好的、6个较好的、4个一般的、4个较差的。考核成绩好的，中央给予通报表扬，还奖励5个亿的奖金；较好的就是公布等次，不表扬也不批评；一般的，约谈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较差的约谈省委书记、省长。经过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后，就开始约谈程序。由分管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约谈，把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召到北京来，在中南海谈。

第一年，约谈了考核等次较差的4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约谈了考核等次一般的4个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我看他们来的时候神情尴尬，约谈中有的面红耳赤。约谈时先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然后通报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违背了哪一条，怎么整改？就事说事，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约谈过程中，这些领导同志的态度都非常端正、非常诚恳。没有一个不承认问题的，更没有一个是抵赖的，少数的有一两句解释，也在情理之中。

首次约谈，对各地触动很大，体现了较真碰硬。有的省委书记、省长被约谈后，非常不安，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学生，工作后是好干部，从小到大都是被肯定的，今天是第一次被约谈。”其实，有些问题是发生在村里的，有的县委书记都不知道，省委书记、省长更不了解。但这就是较真碰硬，倒逼真抓实干。

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

精准扶贫是先进理念、科学方法，其实质就是因地制宜制宜、因材施教。核心内容是做到“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解决“四个问题”：扶持准、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在实际工作中，建档立卡、驻村帮扶、易地搬迁、小额信贷、光伏扶贫、地区协作，这些都是重要举措，是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范例。

一是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前提是把贫困人口找出来并建档立卡。2014年春节期间，建档立卡方案设计出来了。收入在国家扶贫标准之下，以及“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没有解决的农户就认定为贫困户。但地方落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农村人口流动性大，本身就困难，而且很多村干部认知不同，缺少执行力，有的还优亲厚友。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报上来的贫困户并不真实。第一次建档立卡时，大约有30%的贫困户是不准的。但是，全国扶贫信息系统建起来了，有了这个抓手就好办了。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查下去，把真的留下，把假的剔除出去，不断进行完善。比如，在2015年、2016年我们搞了两年“回头看”，完善了这个系统，清退了识别不准人口929万人，补录了漏评的807万真贫困户。2017年以后，每年都进行动态调整。脱贫攻坚从头到尾都在做建档立卡这个事，这是一个动态工作，不是一次划个“成分”就定终身，而是始终根据变化及时调整完善。退出机制也比较健全。退出由村委会提名，提名后进行公示，让大家来说是不是真脱贫了。自己认账，村民认同，政府认定，社会认可，这个时候就可以让贫困户退出去，这就是精准退出。退了以后，还要跟踪监测，防止返贫。目标就是解决当时近1亿人的“两不愁三保障”以及安全饮水问题，消除绝对贫困。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都实现了“精

准”这一要求，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政策对准真正的贫困户。我们在基层拿着实际情况对比信息系统，白纸黑字，这就精准了。搞建档立卡第一年有80多万人在做这个事，后来搞“回头看”，动员200多万人。虽然不说这套建档立卡卡系统精准度达到百分之百，但它毕竟还是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况，解决了“扶持准”的问题。

二是驻村帮扶。贫困村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基本都进城务工了，留下的人多数不仅没办法，而且没想法。穷惯了，就“等靠要”；穷怕了，也不敢想。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安排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组成工作队直接到村一级开展帮扶工作，覆盖到所有的贫困村，解决基层工作力量不足问题，打通了帮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

到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每年保持近100万人的驻村规模，同近200万乡镇干部和广大村干部一起奋战在扶贫一线。

派驻干部有知识有文化、见多识广，他们到村里比较超脱，能有效防止村干部优亲厚友的现象。应当说，驻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平时工作中表现比较好的，他们主动申请，很愿意做扶贫这个事情。但是，愿意做就能做好吗？有的干部下去以后，因为不懂农业、农村和农民，想把城市的经验生搬硬套进去；有的干部情绪急躁，只会发号施令，却压根没人听。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不见兔子不撒鹰”，他首先要听得懂、看得见，要见实效，才会认可你。所以，工作队要付出耐心，在实践中了解群众，组织动员群众，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想法。一旦群众认可你，即便你偶尔说错了、做错了，他们也能谅解。

在工作实践中，干得好的驻村干部无一例外都是以行动感动老百姓。他们融入村子，让自己成为村里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成为农民的自家人，然后才能引导、帮助他们。我下去调研时接触到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

有一个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原来在税务局工作，他到村里就改变了一个酒鬼、一个赌徒。这个村有一个村民，酒瘾很大，早上起来就开始喝，一天喝三顿饭，24小时基本没有清醒的时候。一直喝到家里没钱了，就干点儿活挣钱，但一有了钱，又买酒喝。这个驻村的同志就不断给他做工作，耐心地劝说他、帮助他、管着他，一点一点地改变他，让他从一天三顿饭酒减到两顿饭、一顿酒，变成一个正常人，还帮助他贷款、搞养殖。这个人很快就脱贫了，而且发展得很好，后来成为村里的致富先进。还有一个是手艺不错的木匠，每天出去干活都能挣两三百块钱，可惜他好赌，一次输个千八百块钱都很正常，多少天的收入输光了，眼都不眨一下。输光了他再出去挣，然后再赌，再输。他家里人也管不了他，但是这个工作队的同志就管他，盯着他，严防死守，跟他较真，督促他戒赌。这个功夫没有白费，人都是有感情的，你跟我非亲非故，这么为我好，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怎么能一点触动都没有呢？慢慢地，这个人也改变了。他本来就有手艺，只要戒了赌，生活立刻就好起来了。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是因为一些不良习惯致贫，这样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需要工作队的同志们投入很多精力，付出很大的耐心。

驻村工作任务艰巨，工作内容繁杂，要特别注重驻村干部的规范管理和教育。通过广泛的交流，对驻村干部进行培训。同时开展评先表彰，让群众基础好的、成效显著的驻村干部介绍经验，还精选了一些典型案例，让大家互相学。这些同志都很聪明，又有热情，通过交流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等他们干得好了，有了创新，又可以分享给别人。驻村干部的退出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有的是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但是没有干好，那就回去；有的同志确实有客观困难，也要实事求是，妥善安排。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确保新选派的驻村干部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遍”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驻村工作锻炼了一大批

干部。整体来看，驻村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取得了很好效果，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脱颖而出。2020年2月，正值春节期间，突发新冠疫情，近100万名驻村干部逆行到岗。驻村干部一到位，一是继续抓扶贫，二是搞防疫。事实也证明，这支队伍是经得住考验的，不仅使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而且有效抗击了疫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锻炼了机关干部，培养了农村人才。”这些干部是主动下去的，既有社会责任感，又经历了脱贫攻坚战的考验，通过锻炼提高了各方面能力，今后一定有更好的成长，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三是易地搬迁。一些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通水电路成本很高，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年年扶贫年年贫，停止帮扶就返贫，需要实施搬迁“挪穷窝”。

国家在做贫困群众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上花了不少功夫。经过充分调研论证，通过县城集中安置、行政村内分散安置、建设移民新村、依托小城镇或工业园区、依托乡村旅游区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中央按照人均6万元标准，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融资主体资本金、低成本长期贷款、政府专项债务等渠道筹措资金，用于新建住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产业就业后续帮扶等。各地根据发展状况、建设成本等因素，实行差异化补助政策。严格控制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防止贫困人口因搬迁举债。加强安置点扶贫车间建设，支持就近就业。很多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条件很差。但是有的老百姓就是不愿意搬，他们觉得，搬迁不仅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还要增加生活成本。我们充分尊重贫困群众搬迁意愿，知道一些人本意不是不愿意搬，而是有顾虑，缺乏良好预期。对这些人，我们不搞强迫命令，而是请他们到已搬迁的地方去看一看，当他们看到先期搬迁的不仅房子好，老人看病、小孩上学更方便了，还给劳动力提供培训，工作也更好找，生活确实比以前好。看了之后就明白了，也就乐意搬了。

全国共搬迁贫困人口960多万人，建设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安置房266万余套，还同步搬迁一般农户500万人，1000多万人搬迁，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西藏高海拔地区和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甘肃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都把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贵州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贫困人口150多万。云南怒江近40%的贫困人口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搬迁既扶贫脱贫，又促进了当地的城镇化建设。

四是小额信贷。建档立卡发现了13种主要致贫原因，其中缺少资金的占了三成左右。所以2014年国家创新推出了专门针对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产品，还有免费技能培训，支持发展生产，对带动贫困户发展的企业和合作社给予优惠贷款和财政贴息。我们知道，孟加拉国有一个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人，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音译也叫格莱珉银行）贷款100多亿美元给穷人，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我们的扶贫小额信贷提供的贷款是多少？7100多亿人民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免担保、免抵押、免利息的。

贫困户发展产业，搞养殖、搞种植，都可以贷款。国家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的贷款，银行按基准利率放贷、财政扶贫资金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补偿金，可以说非常优惠。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放贷支持了1500多万户贫困户发展生产，92%的贫困户参与了产业扶贫。从2014年到2020年，贫困户的获贷率由2%提高到50%，而且呆坏账比例很低，在1%以下。

五是光伏扶贫。这是新能源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实地察看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营情况，多次就做好光伏扶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光伏发电扶贫，一举两得，既扶了贫，又发展了新能源，要加大力度。光伏扶贫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预先设定的模板，没有现成可循的路子。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让星星之火演变成燎原之势。

从2014年起，国家决定利用6年时间组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具备光伏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其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贫。到2020年底，全国光伏扶贫容量达到1865万千瓦，10万个贫困村建有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村年均收益20万元左右，主要用于设立公益岗位、实施小型公益项目、开展小微奖励补助等，成效非常显著。

六是地区协作。比如东西部扶贫协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上个世纪90年代，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小组组长所推动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开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

2016年7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宁镇实地考察精准脱贫和产业发展情况时说，“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让“干沙滩”变“金沙滩”的关键就在于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来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和担任总书记以来的持续关心、支持、指导。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先后五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提出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指导原则，为闽宁对口协作指明了方向，为两省区干部群众不懈奋斗注入巨大精神力量。担任总书记后，先后于2016年、2020年、2024年3次赴宁夏考察指导。二十多年的久久为功，闽宁两省区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推动建立的五项机制，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促进了民族团结，谱写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新篇章。

地区协作的另一个典型范例是新疆。南疆地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变化，顶得上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变化。以前，南疆一直是纯农业地区，现在有了现代工业，民族向心力进一步增强。这是谁带来的？是国家重点支持和统筹调动发达地区带来的。19个援疆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对口支援新疆，搞产业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在，新疆的纺织、鞋帽、电子等制造业用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南疆地区发生深刻变化，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经济持续增长发展，一、二、三产业增长齐头并进，这就是当年脱贫攻坚搞对口支援的效果。全国动员起来了，全国一盘棋，东部抓得很紧，工作特别主动。他们把西部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做，有效激发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大家都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这就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我们有很多新点子、新办法，但绝不是拍脑瓜想出来的，而是首先通过试点积累实践经验，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向全国推广。比如电商扶贫试点就是这样产生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创新的商业模式与物流网络一天比一天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城市里生活的人早就习惯在电商平台、直播间买东西了，现在广大的偏远农村把自己的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产品通过平台卖到全国各地，生产者自产自销，避免了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也能得到一定实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快速发展的邮政快递业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脱贫地区的农产品通过邮政快递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拉动了当地就业。

甘肃陇南就是我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陇南地处大山深沟，交通不便，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为了把当地盛产的花椒卖出去，每年都开展销会，但经常是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也卖不出多少产品。2015年陇南被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后，这个状况就扭转了。短短几年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陇南电商扶贫的效果是眼看着好起来。那里的同志也非常能干，从试点干成了示范。农产品有多少卖多少，仓库空空，展销会也不开了。由此可见，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跟上，通村公路、宽带网络、物流仓储、快递配送……这些“硬基础”有了，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还不用外出打工，可以陪伴家人。更大的意思是，让贫困群众能够参与到先进互联网技术、新的业态里，这是很不容易的。

何为“林下经济”

□ 王 波

动。这一模式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农耕智慧，又契合“天人合一”的理念，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通过盘活森林资源，林下经济既能保护环境，又能激活乡村经济，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生态层面，合理发展林下经济可以减少毁林开荒、过度砍伐等行为，激发农民保护森林资源的主动性，并通过林下种植、养殖增加生物多样性，构建立体循环的生态系统。有的种植基地采用仿野生栽培技术，化肥使用量减少70%，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25%，形成“乔木遮阴—药材生长—枯叶还田”的良性循环。在经济层面，林下经济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推出有机、无污染的农产品，并积极培育休闲旅游、研学体验等林文旅融合模式，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有的地方探索林下蚯蚓养殖项目，在800亩山区特色干果

经济林基础上开展养殖，仅此一项就使合作社年收入增加220万元。

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激活森林的多重功能，促进产业链延链增效。拓展农业产业链是提升农产品价值、增强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着力构建“林下种植+养殖+加工+文旅”的复合业态，充分发挥林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一是突破初级农产品生产约束。林下种植和养殖的产品多为初级农产品，只有通过精深加工，将其转化为食品或其他用品，才能大幅提升附加值。大力构建精深加工体系，通过现代加工技术将林下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推动产业链向食品、建材等领域延伸，不断提升资源价值。二是创新“林业+”复合业态激活林下经济潜能。以森林资源为载体发展生态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开发自然教育、休闲度假等体

验式消费场景；培育森林康养产业体系，整合健康管理、康复疗愈等功能形成复合型服务产品，创新消费场景，构建复合型产业生态系统，激活生态资源的多种价值。三是以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推动农业迈向智能化。在林下经济中，传感器、边缘计算与云端协同重构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数据驱动、生态增值”的新型模式转型。数字化转型需深化智能技术应用，整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构建智慧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精准化管控，推动传统生产模式向数据驱动型转型升级。

林下经济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资源，创新联农带农机制，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作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新生事物，林下经济离不开制度创新，实现产业强农、生态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土特产”文章，发展林下经济，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延链增效、联农带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蓄积量已超过200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0.17万亿元。其中，经济林种植面积达4666.7万公顷，年产值超过2万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4000万公顷，年产值约1万亿元；森林食物产量超过2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

林下经济是指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在林冠下或林地周边开展的复合型经营活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其核心在于形成林地生态共生系统，通过科学规划，发展多种产业，提高林地综合效益，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赢。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已成为我国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

林下经济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载体，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能够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共赢。依托森林生态系统，林下经济在不破坏林木生长的前提下，利用林下空间开展种植、养殖、采集、旅游等活

惠农和增收富农的目标。一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林下经济的立体空间结构对经营主体的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多元化要求。应因地制宜探索“国企带镇村”“龙头带农户”“合作社带农户”等多种模式，建立“分层适配、协同共生”的复合型生产体系。二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以打造“空间可分层、权属可分割、价值可叠加”的林下经济共同体为目标，鼓励各参与主体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深化林地经营权、空间使用权等制度创新，探索“保底收益+二次分红”“租金+薪金+股金”“碳汇收益返还”等方式，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三是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技术革命重塑生态价值，以模式创新打通转化通道，将“叶子变票子、空气变人气”的生态红利转化为农民收入，让广袤林地成为共同富裕的绿色银行、城乡融合的立体通道和乡村振兴的生态引擎。

